

# 林樂知『文學興國策』與朴殷植“興學說” 比較研究

吳淳邦\* 王長江\*\*

## | 目 次 |

- |  |                        |
|--|------------------------|
| I. 緒論                                    | III. 『文學興國策』在韓國傳播的內外要因 |
| II. 從 <i>Education in Japan</i> 到『文學興國策』 | IV. 從『文學興國策』到“興學說”     |
|  | V. 結論                  |

## | 論文要約 |

1873年，時任日本明治維新政府駐美公使森有禮(Mori Arinori, 1847-1889)在紐約編輯出版了介紹日本歷史概略和美國近代教育制度的英文著作 *Education in Japan*。1896年，該書經在華美國傳教士林樂知(Young J. Allen, 1836-1907)口譯，華人任廷旭筆述成漢譯本『文學興國策』在上海廣學會出版發行；該書的出版引起當時中國知識分子的極大興趣，對晚清維新思想的醞釀起了積極影響；隨着影響的擴大，該書出版後不久即隨其他書籍一同傳入韓半島；1901年，韓國近代啓蒙思想家朴殷植參考漢譯本『文學興國策』編寫“興學說”，上書“大韓帝國學部”。他在“興學說”中痛陳朝鮮末期社會的頹廢現狀，為國家存亡敲響警鐘，提出改革國家的方案。列舉西方尤其是美國的教育制度，提出了針對朝鮮當時教育現狀的革新建議；朴殷植的“興學說”作為朝鮮末期第一個教育改革方案，對於韓國近代教育制度的形成具有先驅意義。

本論文從“譯介學”角度出發，以1896年林樂知編輯翻譯的晚清教育革新方案『文學興國策』和朴殷植“興學說”為研究對象，通過分析兩部作品的相互聯繫與異同，考察晚清漢譯西書在近代韓國的傳播和接受過程，揭示漢譯西書在打破語言障礙促進中韓文學交流中的重要作用。本論文系首次針對林樂知與朴殷植兩部作品進行關聯性研究，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

\* 第一著者：天津師範大學天津市“千人計劃”招聘專家、崇實大學中文科教授。

\*\* 交信著者：崇實大學中文科博士課程研究生。

▪ 主題語: 『文學興國策』, 林樂知, *Education in Japan*, 朴殷植, 興學說

## I. 緒論

中國知名翻譯理論家謝天振(2013, 3)提到翻譯研究時說: “衆所周知, 在傳統的翻譯研究和文學研究中, 翻譯文學往往處于一種無所歸屬、非常尷尬的處境。翻譯研究者只注意其中的語言現象, 而不關心它的文學地位。而文學研究者一方面承認翻譯文學對民族文學和國別文學的巨大影響, 另一方面却又不給它以明確的地位——他們往往認爲這是外國文學的影響, 而沒有意識到翻譯文學作爲一個相對獨立的文學現象的存在。” 這番話足以給我們這樣的啓發: 對翻譯文學地位的認可有助于本土文學的研究, 也有助于研究不同語言、文學和文化的交流。

通常情況下, 一些在本國原本不知名的作品經過另一種語言翻譯之後, 反而會生發出更多活力, 產生更大的影響力。我們在研究一部翻譯作品時, 不能將翻譯成目的語的作品簡單看作是“外來品”, 要綜合原著作者、譯者、目的語、目的語讀者、時代背景等諸多因素綜合分析評價譯作在目的語國家中的價值; 甚至, 當這部譯作流傳到另外一個國家時, 我們還有必要擴展視野研究這部譯作在這一國家的傳播過程及影響, 以增加翻譯研究的廣度和深度。

晚清中國在“西學東漸”的浪潮下, 涌現出大量由西人口授, 華人筆述的漢譯西書, 這些譯書當中不乏文學和社會價值極高的作品, 它們屬於漢籍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些作品有相當一部分以不同形式在同一時期流傳到近代韓國, 並產生過一些積極的影響, 『文學興國策』便是其中一部。1873年, 時任日本明治維新政府駐美公使森有禮在紐約編輯出版了介紹日本歷史概況和美國近代教育製度的英文著作 *Education in Japan*。<sup>1)</sup> 1896年, 該書經在華美國傳教士林樂知口譯, 華人任廷旭筆述成文言譯本『文學興國策』, 在上海廣學會出版發行; 該書的出版引起當時中國知識分子的極大興趣, 對晚清維新思想的醞

1) 該書全稱爲: *Education in Japan: A Series of Letters Addressed by Prominent Americans to Arinori Mori*(Van Sant 2004, 155).

釀起了積極影響；隨着影響的擴大，該書出版後不久便隨其他書籍一同傳入韓國。1901年，韓國近代啓蒙思想家朴殷植參考漢譯本『文學興國策』作“興學說”一文，上書大韓帝國<sup>2)</sup>學部(當時政府的教育部)。他在“興學說”中結合世界各國優勝劣汰的事實，痛陳朝鮮末期社會的頹廢現狀，為國家存亡敲響警鐘，並結合西方教育製度的可取之處提出了針對當時教育現狀的維新建議。

韓中學術界都有對『文學興國策』的相關研究，但大多從翻譯方法論、教育和文化史方面入手研究，少有從該書在國際間傳播的角度進行研究。<sup>3)</sup>此外，關於朴殷植及其作品“興學說”的研究，兩國學術界也多集中于陽明學、歷史、教育、哲學思想等領域，鮮有論著從流入近代韓國的漢譯西書中發掘其著述的緣起。<sup>4)</sup>即使有觀點明確提出朴殷植曾積極接受西方近代教育思想的觀點，但却未能列舉實例加以論證(盧承允 1987, 120)。故本文擬從譯介史的角度出發，以『文學興國策』和“興學說”為研究對象，通過分析兩部作品異同，考察晚清漢譯西書『文學興國策』在近代韓國的傳播路徑和被接受的過程，揭示漢譯西書在打破語言障礙促進中韓“文學”和文化交流時所起的重要作用。

## II. 從 *Education in Japan* 到『文學興國策』

1872年(明治五年)2月3日，森有禮<sup>5)</sup>受命尋找維新圖強的良方，向當時美

- 
- 2) 1897年，朝鮮高宗李熙稱帝，改國號為“大韓帝國”，該稱謂至1910年“韓日合邦”廢止。為方便表達，下文涉及國號和人物國籍表述時，1897年前沿用“朝鮮”，1897年後簡稱“韓國”。
  - 3) 韓中學術界研究『文學興國策』的代表性論文有：趙建民(2001)；肖朗(2002)；吳淳邦(2003)；盧明玉(2007)；김소정(2010)；盧明玉(2010)。
  - 4) 韓中學術界研究朴殷植及其“興學說”的代表性論文如下：윤남한(1972)；吳初子(1977)；金元姬(1979)；南宮勇權(1984)；金孝善(1985)；盧承允(1987)；[中]魏常海(1991)；[中]朱政惠(1998)；노관범(2002)；신창호(2007)；심재기(2011)；김현우(2015)。中國學術界可查的有關朴殷植研究的碩士論文2篇：馮洪彩(2017)；喻靜(2008)。博士論文1篇：[韓]具滋億(1995)。發表在中國刊物上與朴殷植直接相關的研究論文有6篇，其中韓國籍作者發表4篇，中國籍作者發表2篇。且研究多集中于歷史、哲學、儒學、教育領域。幾乎很少從接受學角度入手研究朴殷植思想及著作本身受漢譯西書的影響。
  - 5) 森有禮(1847-1889)：日本明治初期的外交官、啓蒙思想家和教育家。早年留學英國，1870年-1873年出使美國，歸國後任外務大臣，大力傳播、普及西方思想。1885年伊藤博文內閣建立，任文部(教育部)大臣，致力於日本教育的改革。1886年3月廢止原有的『教育令』，頒布『學校令』和『帝國大學令』，4月又發布『師範學校令』、『小學校令』及其他學校通例，

國各界15位著名人士發出了徵詢意見函。他在信函的開篇中寫道：“敬啓者：自膺簡命，駐貴國京都護理公使，除辦理美、日交涉事務外，尚奉特旨，訪察一切凡有益于敝國文學諸事，並講求一切凡有關於敝國振興諸端。度閣下必有卓見良策，請煩一一指教，以作東方開化之助，實為幸甚……。”（森有禮 1896）這裏我們可以看得出森有禮詢問振興國家良策的殷切之情，他的誠懇很快得到各方的熱烈回應，發函後的一個半月內，收到14位名士的復函。森有禮將這些信件內容以及摘自美國教育部的“美國興學成法”（森有禮 2002, 59-60; 65; 66）<sup>6)</sup>加上自己撰寫的“日本歷史概略”匯編成 *Education in Japan* 一書，于1873年1月1日在紐約 D. Appleton & Company出版（吳淳邦 2008, 188）。

時隔23年後的1896年（光緒二十二年），在華美國傳教士林樂知（Young J. Allen）<sup>7)</sup>協同他的華人助手任廷旭<sup>8)</sup>將森有禮編的 *Education in Japan* 選譯成淺近文言文，冠名爲『文學興國策』，並於1896年5月（光緒二十二年春三月）在上海由圖書集成局代印，廣學會出版發行。全書由上下兩卷組成，按內容可劃分爲三個部分：第一部分由翰林院庶吉士龔心銘和林樂知二人所做的兩篇序文組成；第二部分由森有禮所發公函及十三位名士復函的內容組成；第三部分是摘錄自美國教育部的“美國興學成法”。

科舉制度廢除以前，閱讀西學譯書是晚清中國開明知識分子瞭解西方先進文明的主要途徑。林樂知在“譯者序言”中陳述自己翻譯『文學興國策』的動機時稱“世無亘古不能變之法，人無愚昧不能明之心，國即無積弱不能強之勢。欲

---

確立了日本學制的基礎。

- 6) 1896年版『文學興國策』下卷最後一章題爲“美國興學成法”，其下用小號字體注解到“從東京文學部摘錄”，此處“文學部”爲今教育部的舊譯，“美京”即美國首都。
- 7) 林樂知（Young J. Allen, 1836-1907）：字榮章，生于美國喬治亞州，美國監理會傳教士，教育家，翻譯家。咸豐十年（1860年），偕夫人到中國上海傳教。熱衷于中國近代教育事業，曾創辦中西書院，後發展成中國最早的私立大學——東吳大學。中國近代著名報刊『萬國公報』的創始人之一。譯著頗豐，代表作有『中東戰紀本末』、『文學興國策』、『全球五大洲女俗通考』（*Women in All Lands*）、『印度隸英十二益說』等。
- 8) 任廷旭（生卒不詳）：光緒進士，從散見資料可知他擅長英中筆譯，是林樂知主辦的『萬國公報』的華人主筆之一，曾受清廷派遣擔任過駐美公使的隨員，並遊歷過日本。代表譯著：[美]林樂知·任廷旭編譯『全地五大洲女俗通考』、[英]亨德偉良撰，任廷旭譯『印度史攬要』、[英]唐蘭孟編輯，任廷旭譯『廣學類編』、[美]林樂知，任廷旭『文學興國策』；林樂知在『文學興國策·序』中評價任廷旭，“任君長于翻譯，曾經奏派隨使美邦，取到東瀛，于美日兩國文學之成法頗有見聞……能將當日作書者之高見特識曲曲傳出，期于達意而止，不以富麗爲工，以無負森君興學教民，勤勤求益之至意。”

變文學之舊法，以明愚昧人之心，而成(中國)富強之國勢。”(森有禮 2002, 序3) 還說：“然而興學不可無成法，此盡人知之者也。取法不可無成效，此尤盡人知之者也。茲觀是書，以美國之成法，行之于日本，業已名著大效矣。豈不可以日本之成效，轉而望諸中國之人乎？吾知中國之賢士大夫得是書而讀之，當亦然變計，而知取法矣。”(森有禮 2002, 序6) 對比英文版 *Education in Japan* 可知，林樂知翻譯時沒有全書照譯，而是翻譯了森有禮所發公函及十三位名士復函，以及附錄『美國興學成法』，少譯了該書的森有禮講述日本歷史部分的“緒言”，以及維篤尼對森有禮提出日本採用英語作通用語言的回函。從林樂知對翻譯的取舍，可以看出他翻譯『文學興國策』的主要目的是鼓勵中國人效倣日本，變法圖強，學習美國教育經驗和制度(趙建民 2001, 55)。其實，在未翻譯『文學興國策』之前，林樂知本人就已經身體力行嘗試將美國教育新式教育理念“男女教育平等”、“教育與基督教密切結合”“創立各類學校”等在中國試點推行。<sup>9)</sup>

除此之外，為吸引讀者注意，強調譯書的“興國”之能效，林、任二人在翻譯書名時也可謂煞費苦心。英文原書名本為 *Education in Japan*，在此却把“Education”譯為“文學”一詞。如果按現代英漢雙語翻譯的話，“Education”應譯為“教育”，則書名應翻為『教育興國策』。那麼，“教育”為何在一百年前被譯成“文學”？主要是由於當時還沒有“教育”一詞，而“文學”一詞則始於『論語·先進』，孔門四科之一，指的是文章學問。另外，古今中外也曾把一切用文字書寫的書籍文獻稱為文學。清朝科舉以八股文取士，當時的學習和教化都離不開“文章學問”。『文學興國策』的讀者群主要是與科舉相關的讀書人，因此，這裏將“教育”譯為“文學”也不足為怪。這種譯法留下很深的地域、譯者、讀者和時代烙印，是翻譯“本土化”的典型產物。更為有趣的是，*Education in Japan* 完全可以直譯題目為『日本文學策』(『日本教育策』)，但二人却意譯為『文學興國策』，變意義明確的定語短語“in Japan”為所指模糊的動賓結構“興國”，這就能引起更多關心國事的中國人關注該書，真可謂用心良苦(高黎平 2006, 91-92)。

林樂知和任廷旭二人的辛苦翻譯沒有白費，此書在中國出版後，引起了包

9) 1881年，為實現把辦教育作為宗教滲透、推進中國政治改良、擴大西方國家影響的愿望，林樂知辭去上海廣方言館教習和製造局翻譯職務，在上海法租界八仙橋創辦了“中西學堂第一分院”。1882年，又于虹口吳淞路開設了第二分院，合並兩校更名“中西書院”，該校後遷至蘇州，是現蘇州大學和東吳大學的前身。1892年，在上海創辦中西女塾。

括康有爲、梁啓超在內的當時中國知識分子的極大興趣，對晚清維新思想的醞釀起了積極的影響，也對晚清中國近代學校創立運動產生了一定影響(肖朗 2002, 21)。甚至這部譯書的影響還波及到了中國的鄰國韓國。

### Ⅲ. 『文學興國策』在韓國傳播的內外要因

『文學興國策』第一次傳入韓國的具體時間已不可考，但結合當時時代背景及文獻記錄可以發現一些它在近代韓國流傳的內外要因：從內部看，1876年朝日『江華島條約』的簽訂，標志着一貫施行閉關鎖國政策的朝鮮王朝正式步入開化期。<sup>10)</sup> 開化期的韓國進步知識分子與同時期追求國家圖強的中國知識分子一樣，重視西學的啓蒙教化作用。加上他們大都自幼研習漢文，擁有深厚的漢學功底，閱讀從中國傳入的漢譯西書成爲當時韓國知識界研習西學的主要途徑之一。此外，受“民族主義”啓蒙思潮的影響，部分學者開始用“純韓文體”或“韓漢混用體”翻譯從中國傳入本國的漢譯西書；還有部分學者爲適應韓國本土讀者的需求，吸收其中部分內容進行編譯。近代韓國文學家安自山曾于1922年在其著作『朝鮮文學史』中回顧開化期韓國小說特點：“小說的創作大多通過模倣漢譯西書或日本文學作品而來。其中歷史小說『法蘭西新史』、『普法戰記』、『瑞士建國志』、『越南亡國史』等大受讀者歡迎，這些小說的素材大多取自西方偉人事迹、政治和歷史事件等。”<sup>11)</sup>經查，這裏提到的韓譯本『法蘭西新史』、『普法戰記』和『瑞士建國志』都由漢譯本改譯而成，它們在開化期韓國的流行是近代韓國知識分子積極接受漢譯西書的有力證明。

從外部看，1894年甲午中日戰爭在朝鮮半島海域爆發，李鴻章允許林樂知主管的廣學會下屬機關報『萬國公報』使用戰事電報記敘中日戰況。1896年8月，林樂知、蔡爾康合作編譯並刊印了『中東戰紀本末』一書，該書總8卷，林樂知利用『萬國公報』情報收集的便利，收錄了部分有關甲午戰爭的奏疏、詔

10) 1876年朝日『江華條約』簽訂，朝鮮被迫打開國門，代表文明化、近代化概念的“開化”一詞自日本傳入朝鮮。參見李光麟(1999, 37)。

11) “小説도 亦漢譯과 日本文學의 擬作의 二方面으로 出하다. 歷史小説의 法蘭西新史、普法戰記、瑞士建國誌、越南亡國史 等은 一時 大歡迎을 受한 者다. 그 小説의 材料는 西洋偉人의 事跡、政治의 歷史等에서 採한것이니……”(安自山 1990, 124)。

令、函牘、條約、布告等文件，還刊載翻譯了中外報刊上關於這次戰爭的戰訊和評述。該書一經問世，深受晚清朝野上下人士的好評。1897年2月，為補充前書的闕佚，在原書基礎上推出了『中東戰紀本末續編』。有了『中東戰紀本末』熱銷的先例，為擴大『文學興國策』的銷售量，達到在中國傳播美國教育理念的目的，林樂知將單行本『文學興國策』上下兩卷以附錄的形式編入『中東戰紀本末續編』一並發行。朝鮮建陽二年(1897)，林樂知向朝鮮君主獻『中東戰紀本末』，朝鮮君主閱讀後囑托宮內大臣李載純致信林樂知：“謝贈『中東戰記本末』書……並大加褒獎，仍賜(林樂知)以繡屏一摺。”(韓國學文獻研究所 1979, 21)這是『文學興國策』第一次以『中東戰紀本末附錄』的形式傳入朝鮮宮廷內部。

1900年3月，韓國近代文學家，翻譯家，皇城新聞社主筆玄採用“韓漢混用體”選譯了『中東戰紀本末』八卷，及『中東戰紀本末續編』三卷的部分內容，冠名『中東戰紀』，分上、下兩卷。其中『文學興國策』雖未被玄采選譯，但作為『中東戰紀本末續編』的附錄，『文學興國策』至少在1900年前已經在韓國民間流傳開來。

『文學興國策』傳入韓國民間的事實見于『青年時節李承晚——漢城監獄生活(1899-1904)和『獄中雜記』研究』一書。李承晚(이승만, 1875-1965)，大韓民國第一屆總統，1894年進入“培材學堂”就讀，後參與獨立協會運動，1899年被大韓帝國政府逮捕判刑。1904年獲赦，其後充當“大韓帝國”高宗皇帝李熙的密使出使美國。該書詳細整理了李承晚1899-1904年間所著『獄中雜記』的內容，其中包括李承晚在監獄中的譯著、論述、所覽書目錄、謄抄文，現摘錄如下：

- ① 譯著名錄：『中東戰紀』純韓文譯、<sup>12)</sup>『主僕問答』純韓文譯、『替集』1卷著(律詩)『算術』1卷 純漢文著、『摘珠探璧』著
- ② 用漢文書寫的有關教育論述文：『務興新學論』、『求益貴能學人』、『立國以教化為本』、新譯『中東戰紀』附錄(序)
- ③ 『獄中雜記』所覽書錄第一部分：『平山冷燕』(再覽)、『泰西新史』、英文『萬國史略』、英文『新約』、漢文『公法會通』、漢文『自西徂東』、漢文『中東戰紀』、韓漢文『中東戰紀』、英文『天路歷程』(再覽)、英文月報六十卷、英文『朝鮮史記』、漢文『尺牘合璧』、韓漢文<sup>13)</sup>『西遊見聞』、

12) 原文為“國文譯”，本文為方便讀者理解，改為“韓文譯”，下同。

13) 原文為“國漢文”，本文為方便讀者理解，改為“韓漢文”，下同。

漢文『萬國公報』(二件:二卷、五卷)(柳永益 2002, 406-407; 409)

- ④ 謄抄文: 『美國興學成法--從美京文學部摘錄』(柳永益 2002, 451-461; 森有禮 2002, 66)

從上述記載可以看出李承晚不僅閱讀了漢文『中東戰紀本末』及玄采譯韓漢文『中東戰紀』譯本，還親自用“純韓文體”翻譯了『中東戰紀』全集。這一發現充實了近代韓國知識分子接受和吸收漢譯西書的具體事例。重要的是，經過比對發現“④謄抄文”一欄的『美國興學成法--從美京文學部摘錄』與『文學興國策』第三部分中的『美國興學成法·從美京文學部摘錄』只字不差。『文學興國策』曾經“東渡”韓國並流傳韓國民間的事實也就得到了印證。但是僅有此例還不能證明『文學興國策』在開化期朝鮮知識階層間傳播的普遍性，也無法在文本中考察韓國知識分子對該書的接受程度。

#### IV. 從『文學興國策』到“興學說”

無獨有偶，進一步搜尋開化期韓國其他文史哲相關著作，發現與李承晚同時期活動的朴殷植在1901年所作的“興學說”一文與1896年漢譯本『文學興國策』中的部分語句完全相同或部分相似。

朴殷植(박은식, 1859-1925), 字聖七, 號謙谷, 本貫密陽朴氏, 出生于黃海道黃州。韓國近代史上著名的愛國啓蒙思想家、教育家、報人、歷史學家、獨立運動家。他自幼聰慧, 1868年(10歲), 進入其父任訓長的私塾學習朱子學和詩文, 剛入學不久即在詩文創作上嶄露頭角, 被坊間傳為“神童”; 1880年(22歲), 主動找到朝鮮著名實學家丁若鏞的弟子申耆永和丁觀燮學習古文, 期間涉獵大量丁若鏞有關政治、經濟、社會、法律的著述, 這為他日後融匯東西實學思想奠定了基礎; 1882年(24歲), 師從平安北道泰川第三十代朱子學世家傳人“朴文一”, 系統學習朱子學。朴文一曾對其作文能力有如下評論: “世之論文章者, 必以殷植為之屈指。”; 1885年(27歲), 奉母親之命參加鄉試, 受到當時黃海道觀察土南廷哲的賞識; 1888年(30歲), 受閔泳駿<sup>14)</sup>推荐赴任崇仁店

14) 閔泳駿(1852-1935): 政治家, 字君八, 號荷汀, 依靠朝鮮後期守舊派閔氏家族勢力參

參贊，隨後開始步入仕途，與守舊派官員交往甚密；1898年(40歲)，加入社會政治團體“獨立協會”並擔任『皇城新聞』主筆，此時的朴殷植通過閱讀從中國或日本流入韓國的新書籍、報刊、雜誌瞭解西學。“興學說”即是他本人接觸西學思想後所作的融匯東西的教育論(盧承允 1987, 7-17)。

上文提到的“興學說”一文原為朴殷植于1901年上書“大韓帝國學部”的公文，後收錄于朴殷植手抄論文集“謙谷文稿”中，是一篇能夠充分體現朴殷植維新教育思想的論說文。全文可分為四個部分：第一、教育與國家興亡的關係；第二、介紹西方教育的學科建設情況；第三、痛陳韓國教育不振現狀；第四、針對當時大韓帝國現狀，提出六項教育維新方案。這四個部分，除第三項外，其餘三項所述內容多是由『文學興國策』中摘錄改編而成。下面按照“興學說”前兩部分的順序，就兩部作品異同做簡要分析，探究百年前朴殷植接受漢譯西書時的具體思路。

## 1. 教育與國家興亡的關係

“文學”一詞在“興學說”中出現15次，且後面多綴有“興”、“振興”、“盛衰”等程度副詞，還有一處這樣寫道“夫欲文學大興，則全國之內，市邑鄉村莫不有學，盡人可讀，而後可也。彼開明諸國，以國中稅入之款太半用作文學之經費，而出於民捐者亦多。今宜廣諭國民，有出義以創設學塾，出力以購致(置)機器者，或賜以官爵，或為之保護，則塾舍可廣，機器可致也。”“文學經費”與“創設學塾”、“購置機器”聯係在一起，正說明了這裏的“文學”並非現代意義上“文章學問”的意思，而是與學校、技術相關的“教育”；“興學”也非簡單振興學問，而是振興教育。文章開篇即點明文學(教育)是國家強盛的根基，文學興則人民智慧，人民智慧則國家也會隨之富強的主旨：

“國由人而立，人由學而成。欲論國之為國，當論人之為人；欲論人之為人，當論學之為學；學也者，所以盡天下之理，成天下之務者也。若以興文學為政治中一事，則不亦淺之為知哉。蓋文明之效，智慧日開，事業日進，人民富強而國隨之矣；鄙野之習，智慧不開，事業不進，人民貧弱

---

政，曾任平安道觀察使。日本占領朝鮮後，被授予子爵稱號。

而國亦隨之矣。”<sup>15)</sup>(朴殷植 2002, 第三卷 348)

『論語·雍也』中，孔子有言：“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這裏提到的“立人”是人與人之間的道德行為準則。朴殷植在此也提出了“立人”，強調人是國家立國之本，立人需要先開教育，使人民有智慧，人民有了進步，國家才會富強。

隨後，朴殷植從正反兩個方面介紹世界不興學和興學兩類國家各自的處境，由此得出“文學不興(國家)則衰頹，文學大興(國家)則驟強”的結論。這裏所列各國興學與否的情形大多摘自『文學興國策』。具體可對比下文：

今欲表明文學有益于世人之證據，可觀以下諸事而得之。昔在希臘，以十千有教之民，與波斯十萬不教之民戰而勝之，由于文教昌明，學術淵博，故雖服于羅馬，而終不減其教化之權力…… 但觀近日各國之情形，更可得文學之有益之好證據矣。有教化者國必興，無文學者國必敗。斯理昭然也。即如三百年前之西班牙，實際為歐洲最富之國，嗣因文學不修，空守其自然之利益，致退處于各國之後而不能振興。(森有禮 2002, 21) --“潘林溪教師復函”

即在敝國，開國第一民主華盛頓在位八年，當退位時告于衆曰：“國家之要政，莫若振興學校，以廣傳學問于衆民。合衆國之政府，既合衆心以掌其權，則夫興學之事，足以啓發衆心之文明者，不更當視為至要乎？”(森有禮 2002, 65) --“岡奈底格邦教育部教務長葛理梅‘美國捐設公學成法’”

支那四千年間，世道之隆替，國祚之脩短，舉由乎文學之盛衰。而觀於近日東西各國，尤可大驗矣：印度以教法之不善，風俗之不變，乃服屬於他國；……西班牙昔為歐洲最富之國，而因文學不修，乃退處各國之後，而不能振；葡國土田肥沃，而農工踈惰，全國人民識字者不過十分之一故，近益不振也；……希臘以十千有教之民與波斯十萬不教之民，戰而勝之；英國延致法人之多義有學者以教國人，製造日新，富強日增……美國當其未立國之先，勉勵學業諸科，學校無一不備，男女老幼無一不讀書史，卒能勝英而自立。華盛頓在位八年，當退位時，告於衆曰：“國家之要政，莫若振興學校，以廣傳學問于衆民。”由是各邦互相爭勝，廣添學

15) 原文無標點，標點為筆者後加，下同。

塾(朴殷植 2002, 第三卷 349-352)。--“興學說”

對比上文和下文，可以發現上下部分內容有多處重疊部分，但文章結構却大不相同。上文敘述中美國潘林溪教師站在興學成功者的立場上，首先列舉了希臘“文教昌明，不減教化之權力”這一正面事例，後面才舉出反面國家西班牙的“文學不修，不能振興”。下文則不同，朴殷植首先有意提出歷史上中國的興衰更替與文學盛衰有關，讓本國讀者從身邊熟悉的國家開始有一個直觀的感受；然後列舉印度、西班牙等國，以警示本國讀者；最後才列舉興學起家的正面國家英國、美國等。

上文『文學興國策』中出現了“民主”一詞，這裏“民主”根據語境可知是“人民之主”，即“國家元首”。林樂知之所以將其翻為“民主”，與他的基督徒身份不無關係。基督教主宰宇宙萬物的“God”在漢語中被譯作“天主”。從基督教角度看，將主宰地上一國命運的總統譯成“民主”一詞自然可以理解。朴殷植雖然引用了『文學興國策』中有關美國總統華盛頓的事迹和言論，但在表述上做了調整，省略了“民主”、“合衆國”之類的陌生詞匯，站在韓國本土化的立場上在這詞造句上重新做了調整。

## 2. 介紹西方教育的學科建設情況

“興學說”介紹西方近代教育學科建設的內容大部分取材于『文學興國策』中岡奈底格州教育部教務長葛理梅的回函“美國捐設公學成法”。葛理梅的回函主要針對森有禮的公函中有關文學的五端：富國策、商務、農務與製造、倫常道德、法律與國政予以詳細答復：

今試遵照日本駐美公使森君來函所條列者，逐一策對之。第一條，論文學有益于富國之策……格致之學，能使地學家查明地中所藏有用而可貴之金類，且能測量其礦產之多寡、礦質之貴賤焉。格致之學又能使人知，用何法可化一國中無用之物料，盡成爲有用之物產；第二條，論文學有益于通商之事……夫通商有大道，爲整頓商務所當知者，有如錢糧徵稅之法，銀行匯兌之章，造船製艦之方，機器行海之術，海程沙線之表，天文經緯之度，皆賴國中有積學多才之人，方可勝任而愉快也；第三條，論文

學有益于倫常道德身家諸端……人之飲食，不潔而致疾者，果何以然哉？非因其不明養生之道乎？且或居不爽快之房屋，以致瘟疫、創虐、霍亂諸疾叢集于人身者，非因其不明所食、所飲、所吸之多毒乎？文學所以使人明于養生之道，而免受一切人生之患害耳……第四條，論文學有益于法律國政……誠能使通國之人，心服于在上者之公平正直，深信夫執政者之無偏無私，則其國勢之堅固不搖，較諸厚集兵力而更有權矣(森有禮 2002, 45-49)。

—“岡奈底格邦教育部教務長葛理梅‘美國捐設公學成法’”

蓋泰西之學有農學、商學、武學、醫學、礦學、哲學、化學、法律學、工藝學、測算繪圖、天文地理、光電、聲重、汽機等學。蓋其農學興而土地之宜無不明也，樹藝之法無不良也，新式之機器無不利也，有一種百獲之益矣；商學明，而造船製艦之方，機器行海之術，海程沙線之表，天文經緯之度，莫不有深造之妙，轉輸交易遍於五大洋地球之上矣；講求地中所藏之金類，測量礦產之多寡、礦質之貴賤，且化無用之物產為有用之物品者，礦學之效也；慎於飲食，潔其房屋，明於養生之道，免內感外傷之患害，救人之痛苦，濟人之橫札，增人之壽，算醫學之效也；合於人心之本然，鑒於世事之當然，而明辨之，審之之，使通國之人服於在上者之公平正直，深信夫執政者之無偏無私，以為國家堅固之基者，非律學之效乎？培養一代之忠臣勇將，奏勳於戰爭之際，造就議政行政之才，以需經濟之用者，俱非學問之效乎？水有輪舟，陸有鐵路，明電氣，造電信，皆格致學之功。詳此數者，餘皆可推矣(朴殷植 2002, 第三卷 353-354)。

—“興學說”

從上文和下文的對比中不難發現“興學說”雖大量借鑒『文學興國策』內容，但朴殷植很用心地對文章結構作了藝術性處理，如首先用排比列舉西方諸專業，然後按所列專業順序，擇部分專業論述學習這些專業的優勢，並站在讀者的角度發揮文章的說教功能，使做成的文章讀起來氣勢磅礴，且無冗雜重復的語句，容易引起讀者的共鳴。如“非律學之效乎？俱非學問之效乎？”更是連用兩個反問句加強了語氣的渲染，讀來頗具穿透力。除了前面兩個部分，第三部分痛陳韓國教育不振現狀，直抒胸臆，語言犀利，針砭時弊，對於今天社會而言，仍能起到警示作用。

### 3. “興學說”中的六項教育維新方案

“興學說”第四部分針對當時大韓帝國的現狀提出了六項國家教育維新方案，其中大部分內容亦多取材于『文學興國策』，下就六項方案摘錄如下：

(1) **維持宗教。**歐洲各國之俗，以維持宗教為保全國脈之道。我亞洲之為孔子之學者，獨不思維持之方乎哉！維我列聖朝宗師孔孟，闡明人倫，治隆俗美，儒賢輩出。溯考百年以前，士皆懷仁蹈義，砥名礪行，以國事為己任，舍命不渝。雖土禍屢作，而士氣不衰。百年以後，士之自好者以不仕為高，進取之士奔走場屋，專治浮文；雖讀孔孟之書，而大失孔孟之意，至于近日，並其書而束之高閣，不知名節之為何；事唯利是爭，雖至忘君負國而有不顧焉，世道人心極為寒心。矧今外教日熾，全國人民有胥溺不返之勢，維持宗教，圖回固有之元氣，又仁人君子汲汲用力處也。夫列郡鄉校，即衛聖之地，養士之所。而挽近弦，誦不作專，以酒食為事，禮貌不存，士習可歎。宜自政府明飭府郡，選取一鄉之善士，處之校堂，以讀書講道為事，又試以經義、時務、算術、法律等學 ……<sup>16)</sup>

(2) **廣派學徒于各國，另聘教師于外國。**夫學必有師。今欲振興新學，不可不先學于外國也。是以日本維新之日，廣選國中聰穎子弟，派遣英、法、德、美等國。分類學習各種實學，學成回國，隨才授任。今其內外諸大臣，功名赫赫者，無一非熟遊西國，通達新學之人。我國亦自比年以來，士民子弟之稍有志氣者，率多願學于外國以需世用，亟宜獎勸，俾遂其願，隨其所長，分習實學以為他日教導之職、需用之才，則不世之功名必出於此輩人；且又照會開明諸國，聘其優於學問，熟於教導之名師以教國人，則新學漸興於國中矣。

16) “宗”在王力主編的『古漢語常用字字典』解釋有宗廟、祖廟、宗族、尊奉、主旨、宗旨等意；而“教”則有教育、教導、諸侯王公的公告、宗教、使、傳授之思。”宗教“一詞在商務印書館『現代漢語詞典』中的解釋是”一種社會意識形態，是對客觀世界的一種虛幻的反映，要求人們信仰上帝、神道、精靈、因果報應等，把希望寄托于所謂天國或來世。“朴殷植在『謙谷文稿·宗教說』中提到：“宗教者，道德之學也；諸科學校者，經濟之術也；二者固當並行，而國家于道德之教尤當致敬而盡力焉。”見朴殷植(2002, 第三卷)。結合上文所述，可見“維持宗教”並非維持今天所指的宗教，而是維持儒家孔孟人倫道德教化之意。

(3) **公私捐款，廣設學塾。**夫欲文學大興，則全國之內，市邑鄉村莫不有學，盡人可讀，而後可也。彼開明諸國，以國中稅入之款太半用作文學之經費，而出於民捐者亦多。今宜廣諭國民，有出義以創設學塾，出力以購致機器者，或賜以官爵，或為之保護，則塾舍可廣，機器可致也。人情自非至無知之人，莫不欲教其子弟，雖非抑勤，可致捐助，況有褒獎之典，則其孰不樂而趨之？

(4) **廣刊書籍。**夫國中之書籍富，然後學人之見聞博，外國藏書樓之設以此也。我國書籍甚貧，已多學人之恨，而況新學之書，來者無幾，凡史鑑、地誌、物理、農工、法律、栽培、養蠶等書，用國漢文多為譯印，以開國人之見聞。若『小學』、『三綱行實』等書，譯以國文，使人皆可讀，則人心可啓，文教可溥也。

(5) **講究教法。**人之為學，莫要於良師。今郡校教員有自速成科中差遣者，六朔所學，果可為師乎？教育之事，苟且甚矣。美國有教師聚集之會，每年放學時，預先擇地訂期，聚集各師，並請著名之教師為之主講而討論之；亦或於每月給暇兩日，以為各師勤求教法之助。蓋國中文學既興，人才日盛，則師範之才愈形其不足，教師之學問尤不可不長益也。今宜倣此意，每年放學時，自學部訂期聚集教員之學，如有不可為師者，則使之更就學校，以究其業可也。

(6) **施罰警惰。**先王之法，有學業不成者，施以屏黜不齒之典。今美國之制：如有甘心愚昧自棄而不學者，罰英金一鎊不貸；有任子弟遊蕩廢學者，罰之無赦。今宜倣此意，訓飭府郡。凡人民有子弟而不教或年少而遊蕩者，另立罰規，期於人皆有學，免於犯法可也(朴殷植 2002, 第三卷 359-364)。

朴殷植首先提出了維持宗教，認為歐洲各國的國脉習俗得以維系不衰的原因在於“維持宗教”，發出對亞洲研習孔子學說的學者不思維持儒學教化的感嘆，指責當時社會人們將書本束之高閣，不講名節，做事唯利是圖的不良風氣，而產生這些不良風氣的根本原因在於沒有維持儒家的教化。在“外教日熾，全國人民有胥溺不返之勢”的情況下，朴殷植感受到儒家孔孟教化受到外來宗教的威脅，因此建議政府通告地方府郡選取當地賢能人才建立學校，教導

民衆學習孔孟之道，以維持國家固有的“元氣”。

其次，他還提出“廣派學徒于各國，另聘教師于外國”的建議，其中列舉日本明治維新時期選派學生到歐美留學的成功案例，強調留學對學習新學，建設富強國家的必要性；最後還提出“公私捐款，廣設學塾”、“廣刊書籍”、“施罰警惰”的國家教育方案，無不是取材于『文學興國策』中的“興國”策略。從選派留學生到徵聘外國教師；從建議廣設學校到鼓勵廣刊書籍；由教育普及大眾到具體針對個人的施罰警惰，朴殷植參照『文學興國策』，結合自國的實際情況，全方位地編織了一幅大韓帝國未來教育藍圖。或許正是『文學興國策』鼓舞了他在韓國力推維新教育思想的決心。

大韓帝國光武八年(1904年)十一月，朴殷植受日本人加藤曾雄的資助，在博文社刊行了『學規新論』一書(朴殷植 2002, 第三卷 453-486)。該書開篇部分分別由李沂、金澤榮二人各作序文一篇，正文論述內容按題目分13個小節，最後為李裕楨所作跋文一篇。正文的13小節題目分別為“論學要活法、論學要遜志、論學由發憤、論遊學之益、論普通及專門、論國文之教、論設塾之務、論印書之宜、論勸懲之規、論試驗之法、論仕優而學、論國運關文學、論維持宗教。”“興學說”中提到的六項維新方案在該書中都得以體現。『學規新論』是朴殷植東西融合的個人教育思想體系成熟的體現，是近代韓國教育思想“西學東漸”的鮮明個案，是近代韓國儒學革新的代表著作。中國學術界有關『學規新論』的研究尚屬空白；相反，韓國學術界的相關研究可謂枝繁葉茂。早在1972年，韓國學術界已經發表了探究『學規新論』與“興學說”內在關聯性的學術論文，隨後更是陸續出現不少從不同側面研究兩部作品的論述。<sup>17)</sup>但目前為止，沒有發現涉及兩部作品與『文學興國策』之間內在關聯性研究。

除此之外，1906-1909年間，朴殷植通過報刊發表了大量有關教育的論說，查『白岩朴殷植全集·第5卷·時文』，他所作與教育相關的時文有：序·跋文共2篇、翻譯7篇、<sup>18)</sup>論說9篇。1906年，朴殷植組織‘西友學會’致力於振興大韓帝

17) 關於朴殷植『學規新論』的主要研究論文有：윤남한(1972)一文在第5節「興學說과 王學思想」中詳細介紹了“興學說”內在聯系；隨後陸續又有論文從不同側面對兩部作品做了細致研究：“신창호(2007)主要從“儒教哲學的教育性變容”的觀點出發考察近代韓國儒教的分化樣態；김현우(2014)重在闡釋論證『學規新論』中朴殷植有關『論語』的解釋與丁若鏞的『論語古今注』對『論語』的解釋存在內容一致部分；김현우(2015)是“『學規新論』에 나타난 朴殷植의 經學觀 研究”的延續，着重審視近代韓國儒家知識分子的教育思想和邏輯特徵，是研究『學規新論』的論文中文本分析較為詳細的一篇。”

國的教育事業，西友學會在合並為西北學會之前就認識到教師的培養在教育救國中的重要性，為此特意設立了西友師範學校。西友師範學校分速成師範和夜校，朴殷植任第一任校長。朴殷植也曾大力提倡主張國文(韓文)教育，他認為只有國文才能從根本上開發民智，開展教育救國運動(盧承允 1987, 55; 具滋億 1998, 171)。為促進韓國近代教育改革達到教育強國的目的，朴殷植不僅著書立說，還身體力行地創辦學校，並親自從事教育及教科書的編撰工作。綜合“興學說”與『文學興國策』之間的內在關聯性來看，朴殷植近代教育思想的形成，教育活動的展開等都受到了『文學興國策』的深刻影響，漢譯西書在韓中思想文化傳播間的重要性由此可見一斑。

## V. 結論

1873年，日本著名教育家森有禮在美國紐約編輯出版了以介紹西方(美國)教育為主的英文著作 *Education in Japan* 一書。23年後這部著作被長期旅居中國的美國基督教傳教士林樂知發現，林樂知為實現他在晚清中國‘以文傳教’的目的，協同其華人助手任廷旭將這本英文著作翻譯成漢譯本『文學興國策』在中國上海出版。這本漢譯西書的出現不僅對中國近代教育的變革起到巨大的影響，還影響了近代韓國教育制度的改革進程。

大韓帝國皇室、韓國開國總統李承晚、韓國近代著名思想教育家朴殷植都曾接觸『文學興國策』。其中李承晚在獄中生活期間摘錄了該書的部分章節；朴殷植則于1901年作上書大韓帝國學部的“興學說”一文時參照了書中的大部分有關西學的內容。

朴殷植的“興學說”雖大量參照『文學興國策』內容，但通過比較研究發現朴

18) 翻譯7篇分別為：“美國教育進步歷史，”『西友』第1號，1906. 12.; “學校之制，”『西友』第1號，1906. 12.; “愛國論(1~2),”『西友』第1~2號，1907. 1.; “學校總論(1~4),”『西友』第1~3號，1906. 12.~1907. 3.; “廣新學以輔舊學說，”『西友』第3號，1907. 2.; “論幼學(1~5),”『西友』第6~10號，1907. 5.~1907. 9.; “家庭教育特質，”『西北學會月報』第1卷第13號，1909. 6(朴殷植 2002, 第五卷)。(除論說文翻譯外，1907年，朴殷植曾以韓漢混用體翻譯晚清中國著名報人鄭貫公(1880-1906)1902年由日文譯成的政治小說『瑞士建國志』，這也是朴殷植翻譯的唯一一部以漢譯本為底本翻譯的韓漢混用體小說(鄭貫公 1902; 朴殷植 2002, 第五卷)。

殷植並非單純地摘抄拼湊文章，而是結合當時韓國的社會現狀因地制宜地對文章做了內容上和順序上的調整與變形；此外，因他自幼接受系統的朱子學教育，故在接受『文學興國策』西學教育思想的同時，仍堅持東方傳統儒家倫理價值觀，這種東西兼容並包的教育理念在那個時代是難能可貴的。除內容和思想之外，朴殷植的漢文寫作風格也很獨特，行文灑脫自然，邏輯清晰，通俗易懂，且感情充沛易于感動人心，極富文學價值。

1904年，朴殷植在“興學說”的基礎上編著並出版了單行本『學規新論』。全書系統地展現了朴殷植融合東西的教育思想，它是『文學興國策』在近代韓國的又一對話之作，也是近代韓國第一部專門論述教育的單行本著作，其在韓國教育史上的意義已得到學術界普遍認可。本文通過『文學興國策』與朴殷植前後兩部作品的比較研究，梳理出朴殷植接受西方近代教育思潮影響的路徑，為東亞地區近代思想文化交流的研究提供又一可供參考的思路，即通過漢譯西書窺見近代東西方文化交流之實況與內涵。

『文學興國策』這部“非文學”的譯本在日本、美國、中國、韓國四國間出版、翻譯、傳播的過程中，擁有比一般文學作品更高、更富特色的文本價值，它的價值正是通過翻譯得到了升華，是翻譯賦予它在中國和韓國的新生；更是翻譯貫通了東西文化交流的橋梁，讓“文學”在韓國與中國間的傳播更加多彩，更顯特色。

| 參考文獻 |

- 김소정 (2010). “美國 改新教 宣教師의 中國化 翻譯戰略: 『Education in Japan』에서 『문학흥국책(文學興國策)』으로의 轉變.” 『中國研究』. 49卷, pp. 3-28.
- 金元姬 (1979). “韓國의 開化期教育思想研究.” 建國大學校 博士學位論文
- 김현우 (2014). “『學規新論』에 나타난 朴殷植의 經學觀研究.” 『民族文化』. 43卷, pp. 417-449.
- \_\_\_\_\_ (2015). “朴殷植과 『學規新論』—『學規新論』解題를 兼하여.” 『人文學研究』. 24卷, pp. 79-104.
- 金孝善 (1985). “朴殷植의 教育思想 研究.” 延世大學校 博士學位論文
- 南宮勇權 (1984). “韓國開化期の 社會教育 活動에 關한 研究.” 中央大學校 博士學位論文.
- 노관범 (2002). “大韓帝國期 朴殷植 著作目錄의 再檢討.” 『韓國文化』. 30卷, pp. 263-307.
- 盧承允 (1987). “朴殷植의 民族教育思想研究.” 中央大學大學院博士論文.
- 朴殷植 (2002). 『白岩朴殷植全集』. 全5卷. 東方傳媒出版社.
- 신창호 (2007). “開化期 教育에서 儒學은 어떤 位相을 지니는가: 白巖朴殷植의 『學規新論』分析을 中心으로.” 『東洋古典研究』. 26卷, pp. 75-103.
- 심재기 (2011). “한국(韓國)의 명문순례(名文巡禮): 박은식(朴殷植)의 흥학설(興學說).” 『한글한자문화』. 148卷, pp. 26-28.
- 安自山 (1990). 『韓國學研究叢書 21·朝鮮文學史』. 寶庫社.
- 吳淳邦 (2003). “19世紀 末의 中文譯書 『文學興國策』研究.” 『中國學研究』. 26卷, pp. 297-328.
- \_\_\_\_\_ (2008). 『中國近代小說翻譯과 中韓小說의 雙方向翻譯 研究』. 崇實大學出版部.
- 柳永益 (2002). 『젊은날의 李承晚』. 延世大學出版部.
- 윤남한 (1972). “朴殷植先生의 儒教思想: 陽明思想을 中心으로.” 『나라사랑』. 8卷, pp. 35-55.
- 李光麟 (1999). 『韓國開化史研究』. 一潮閣.
- 韓國學文獻研究所 (1979). 『韓國開化期文學叢書2—歷史·傳記小說』. 亞細亞文化社.
- Van Sant, John E. (2004). *Mori Arinori's Life and Resources in American*. Maryland: Lexington Books.
- 高黎平 (2006). “論林樂知的西學翻譯及其在晚清的接受.” 『國外文學』. 第1期, pp. 89-94.
- 具滋億 (1995). “梁啓超與朴殷植的教育思想比較研究.” 北京師範大學博士論文.
- 具滋億 (1998). 『中韓近代教育思想比較研究』. 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 盧明玉 (2007). “『文學興國策』所體現의 文本、文化關係.” 『河北學刊』. 第27卷. 第2期,

pp. 188-191.

- \_\_\_\_ (2010). “*Education in Japan* 和 『文學興國策』所體現的中西文化互動.” 『江漢論壇』. 第7期, pp. 112-116.
- 謝天振 (2013). 『譯介學』. 譯林出版社.
- 森有禮 (1896). 『文學興國策』. 林樂知·任廷旭譯. 廣學會.
- 森有禮 (2002). 『近代文獻叢刊·文學興國策』. 林樂知·任廷旭譯. 上海書店出版社.
- 吳初子 (1977). “朴殷植의 教育思想.” 梨花女子大學校 碩士學位論文.
- 魏常海 (1991). “朴殷植의 儒教求新論與陽明學思想.” 『延邊大學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 總第78期, pp. 42-47.
- 喻 靜 (2008). “中韓兩民族聯合革命運動史論--以廿世紀廿年代中國關內地區中韓聯合革命運動爲例.” 廣西師範大學碩士論文.
- 鄭貫公 (1902). 『瑞士建國志』. 中國華洋書局. 上海圖書館.
- 趙建民 (2001). “森有禮의 *Education in Japan* 在中國的翻譯及其影響.” 『貴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第19卷. 第2期, pp. 51-59.
- 朱政惠 (1998). ““國魂之不滅者存焉”--朴殷植史學思想之一瞥.” 『韓國研究論叢』. 上海人民出版社, pp. 123-129.
- 肖 朗 (2002). “『文學興國策』與近代中、日、美文化教育交流.” 『浙江大學學報』. 32卷. 第1期, pp. 14-22.
- 馮洪彩 (2017). “近代中韓安重根傳記比較研究.” 山東大學碩士論文.

| 논문투고일 : 2017년 11월 17일 |

| 논문심사일 : 2017년 12월 07일 |

| 게재 확정일 : 2017년 12월 14일 |

## 존 알렌의 한역본(漢譯本) 『文學興國策』과 박은식의 “興學說” 비교 연구

오순방·왕장강

(숭실대학교 중문과)

1873년 일본의 주미공사 모리 아리노리(森有禮)는 미국의 근대 교육제도와 일본의 역사를 개략적으로 기술한 *Education in Japar*을 뉴욕 애플턴서점에서 출판하였다. 이 책은 미국선교사 존 알렌(Young J. Allen)이 구술하고 중국문인 런팅취(任廷旭)가 필사하여 1896년 상해의 광학회(廣學會)에서 『文學興國策』이란 제명으로 번역 간행되었다. 이 중역본은 당시 중국의 지식인 사이에서 대단한 반향을 불러 일으켰으며 청말 유신사상의 발전에 지대한 영향을 미쳤는데, 이 책은 바로 한반도에 전래되었다.

1901년 한국의 근대 계몽사상가 박은식은 『文學興國策』을 참조하여 “興學說”을 편집 기술하였다. 그는 “興學說”에서 조선의 퇴폐하고 타락한 사회현실을 강력히 규탄하면서 교육제도의 혁신을 주장하였다. 서방, 특히 미국의 교육제도에서 취할 점을 열거하면서 당시 조선의 교육상황에 대해 혁신적인 교육방안을 제기하였다. 박은식의 “興學說”은 개화기 한국에서 처음으로 제기된 교육개혁안으로 한국 근대교육제도의 형성에 선구적인 의의를 가지고 있는데, 존 알렌의 교육방안을 상당 부분 수용하고 이를 변형 발전시킨 것이다. 본 논문은 ‘번역학(譯介學)’의 관점에서 『文學興國策』과 “興學說”의 비교분석을 통해 동아시아의 번역문학사와 교육발전사에서 차지하는 두 저작의 위상과 가치를 집중적으로 규명 탐구해 보았다. 본 논문은 존 알렌과 박은식의 저술에 대한 상관관계를 처음으로 비교연구했다는 의의를 가지고 있다.

· 주제어: 『文學興國策』, 존알렌(林樂知), *Education in Japan*, 박은식, 興學說

ABSTRACT

Journal of Asia-Pacific Studies Vol. 24 No. 4 (2017)

**A Comparative Study on Young John Allen's  
*Wen Xue Xing Guo Ce* and  
Park Eunsik's "Xing Xue Shuo"**

**Oh Soon-Bang**

(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 "Thousand Talents Plan" &  
Dept. of Chinese Lang. & Lit., Soongsil University)

**Wang Chang-Jiang**

(Dept. of Chinese Lang. & Lit., Soongsil University)

In 1873, Mori Arinori(1847-1889) was the Minister of the Meiji Restoration Japan govern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same year, *Education in Japan*, an English book of modern American educational system and a brief history of Japan was edited and published in New York by Mori. In 1896,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of the book was translated by American Missionary Young John Allen(1836-1907) and Chinese Ren Tingxu, and was published in Shanghai named as *Wen Xue Xing Guo Ce*; The publication of the Chinese version aroused great interest of the Chinese intellectuals at that time, and had a positive influence on the brewing of the reform thought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With the expansion of the influence, the book was introduced into Korea; In 1901, Korea's Modern Enlightenment thinker Park Eunsik(1859-1925) reference the Chinese version and wrote an article named as "Xing Xue Shuo" submitted to the Imperial Educational Ministry of Korea Empire. He combines the concept about survival of

the fittest, and the decadent situation of Korean society at that time in the paper, and combining the merits of the western education system, especially American education system, puts forward proposals for reforming the education of Korea Empire; Park Eunsik “Xing Xue Shuo” as the first Dynasty of Korean education reform program that has significance on the formation of pioneer modern educational system in Korea. This paper is the first to study Young J. Allen and Park Eunsik’s two works. So it has positive significance.

- Key words: *Wen Xue Xing Guo Ce*, Young John Allen, *Education in Japan*, Park Eun-sik, Xing Xue Shuo